

环境社会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洪大用

[摘要] 环境社会学研究中所体现出的以下一些思想为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第一,环境社会学强调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第二,环境社会学强调社会原因的综合性;第三,环境社会学致力于推动缓解环境问题的社会变革与建设。相应地,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丰富实践,也必将从很多方面促进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关键词] 环境问题;环境社会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作者简介] 洪大用: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2005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首次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号召。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明确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将“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作为发展社会事业、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些都标志着中央已将环境保护和社会建设密切联系起来,认识到加强环保工作要关注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特别是要以综合性、整体性、全局性的眼光来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建设,在社会建设中保护环境,同时在保护环境中促进社会和谐。毫无疑问,这是中央在总结国内外环保经验与教训、在汲取环境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战略思想。我们认为,这里所谓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应该包括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作为一门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年轻的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在坚持环境与社会相互作用这一基本观念的基础上,围绕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开展了非常广泛而且富有成效的研究,日渐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分支学科。我们认为,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所体现出的以下一些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或者说,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第一,环境社会学强调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第二,环境社会学强调社会原因的综合性;第三,环境社会学致力于推动缓解环境问题的社会变革与建设。相应地,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丰富实践,也必将从很多方面促进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大发展。

一、环境社会学强调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

在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

[基金项目]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200108)

始的。从那时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分析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但是,早期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自然科学家的事情,社会科学家介入比较少。早期关于环境问题产生的两种最有影响的解释,都是由自然科学家提出的。一种是以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为代表的“人口论”,另一种是以美国圣·路易斯(St. Louis)华盛顿大学生物学家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为代表的“技术论”。

1968年,埃利希出版了《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该书的书名实际上是把人口增长比作核弹爆炸,对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构成了严重威胁。埃利希认为,那时世界人口增长过快,已经过剩,超出了全球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他指出,1800年,世界上只有10亿人口,1930年是20亿人,后来只经过30多年的时间,就达到了30亿人(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似乎更快,到1990年已经是53亿人,现在已经超过60亿人)。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必然导致资源使用、空间利用以及污染产出的大幅增加,从而导致环境问题。因此,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控制人口。^[1]埃利希的书出版之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进一步反思。

1971年,康芒纳出版了另外一部阐释环境问题的著作,书名是《封闭的循环》(*The Closing Circle*),这本书基本上是与埃利希的书针锋相对的。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康芒纳指出,由于污染的扩大比人口的增长更为迅速,因此,环境衰退不能主要地归因于人口的增长。考虑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技术开发非常迅速,他认为导致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制造业和农业中日益扩大的无机物或人工合成化学品(特别是石油制品)的使用。诸如,塑料代替了木材,清洁剂代替了肥皂,合成纤维代替了棉花,而杀虫剂、除草剂和化肥等则在农业中广泛使用。这些东西不仅不能自然降解,而且生产它们要花费更多的能源,就像用铝代替钢铁一样。因此,康芒纳认为,正是更具环境破坏性的技术代替了不太具有环境破坏性的技术,才导致了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2]

像埃利希的著作一样,康芒纳的著作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其观点却遭到了埃利希

等人的激烈反对,由此引发了双方长达数十年的学术辩论,这种辩论被环境社会学家赖利·E·邓拉普(Riley E. Dunlap)称为“埃利希—康芒纳论战”^[3]。在辩论中,埃利希等人不仅指出了康芒纳研究的一些客观局限,如仅仅关注污染问题,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态问题,仅仅是基于美国的研究,仅仅是针对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情形等,而且进一步阐述了人口增长导致环境破坏的一些具体机制,如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对于水资源的需求,就要改变水资源的自然分布状态,而这种人为的改变则进一步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在这里,埃利希等人实际上也看到了人为的工程技术对环境的破坏作用,但是他们把技术因素只看作是从属的、次级的因素,认为根本的因素还是人口增长。相应地,康芒纳等人则继续为其“技术论”做辩护,尽管他们也部分地考虑到了人口因素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强调技术的发展及其性质的改变是导致环境被破坏的最主要原因。

虽然以埃利希为代表的“人口论”与以康芒纳为代表的“技术论”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基本立场上的差异,但随着社会学家对于环境问题研究的介入,他们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共同性,即忽视了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都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环境社会学家们认为,尽管人口与技术因素对于解释环境状况的恶化很重要,但是如果把人口或技术自身看作是自主的影响环境状况的因素则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不深刻的。要探究导致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就必须了解同时影响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更大范围的社会背景,必须深入研究社会的文化与制度,研究社会的结构与过程。简而言之,环境社会学更加强调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

阿伦·施耐伯格(Allan Schnaiberg)是对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之一。他曾明确指出:过于强调人口因素或者技术因素,对于理解环境问题而言都是不够准确的。首先,就过分强调人口因素而言,与贫穷国家居民的生活方式相比,富裕国家居民的生活方式对于环境所造成的破坏要更大;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中,与穷人的生活方式相比,富人的生活方式对于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也要更大。因此,单纯看重人口的数量,实际上忽视了社会中不同人群对于环境所造成的

差异性影响。其次,人口增长也是与特定的社会状况相关的,不研究特定的社会状况,也就不能正确理解人口增长。如果只从表面上看到人口增长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而不注意分析人口增长背后的社会动力与机制,仍然不能解释导致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不利于科学地控制人口。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容易产生很多负面影响的单纯的控制人口数量论。再次,认为人口增长导致消费增加,进而加剧环境破坏这样一种思维,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为它把注意力只是放在社会中的消费领域,而忽视了社会中的生产领域对于环境的影响。就过分强调技术因素而言,施耐伯格指出:技术开发的程度以及技术使用的状况,都是由特定社会中的经济决策所驱动的。与其仅仅关注技术自身,不如更进一步揭示技术进步背后的社会经济驱动力,特别是要关注生产过程中以技术进步替代劳动的驱动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环境状况恶化的深层次社会原因。^[4]

应该说,在环境社会学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很多环境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导致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提出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比如西方社会中的信仰体系、资本主义制度、城市化进程、消费主义思潮等等,都对环境状况恶化有着重要影响。环境社会学的这种研究,明显有助于拓宽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视野,提高人们对于当代环境问题的理性认识,看到环境问题与特定的社会结构与过程、与人们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关联。相应地,环境社会学者也认为,环境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技术进步来解决,而是需要必要的社会变革与社会建设。很明显,这种认识正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

二、环境社会学强调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的综合性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通过全面的、综合的、整体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建设,以促进环境保护。这里实际上是认识到造成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的特点。我们注意到,在探究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的过程中,环境社会学家的确是越来越认识到

了这一点。他们指出:导致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各种原因往往很难独立地解释环境问题,它们之间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导致环境状况的恶化。因此,环境社会学者越来越注意避免环境问题的“单因论”,越来越倾向于从综合性、整体性的角度来探索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寻求环境问题的综合性解释。相应地,基于“多因论”的立场,越来越多的环境社会学家倾向于这样的政策主张,即通过促进整体性的社会变革来缓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很明显,这种主张是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思路相一致的。

我们还注意到,早期一些环境社会学家在批评“人口论”、“技术论”等观点的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富有洞见的理论观点。这当中,施耐伯格所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非常具有代表性。^[4]

施耐伯格十分关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于环境衰退的影响,他的分析是在资本家追逐利润、自由市场制度以及有限政府的背景下展开的。他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自我强化机制,以及由这种机制所导致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他认为,在自由市场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为了应对竞争,避免在竞争中失败,他们总是试图尽量便宜地攫取自然资源,即使这些资源即将用尽;总是试图为他们的产品创造持续扩大的需求,而不管消费这种产品的环境影响;总是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尽量有效地制造产品并不断推出新产品,而不顾技术进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在这种种努力之下,一些企业成长为垄断型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排斥劳动的大企业,这样的企业与政府又形成密切的关系,甚至影响着政府的决策,以至于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往往对这些大型企业进一步采取支持和庇护的态度,从而更加刺激了这些企业的扩张和发展。

因此,施耐伯格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占有和管理生产资料的少数富裕者制造了环境问题,而不是普通居民的生活消费制造了环境问题。进一步而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下,大多数普通民众是被少数人所操纵的,他们实际上并没有选择的权力和机会。他们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

度上是资本家制造出来的,比如,通过广告和软性文化、价值的生产来影响消费需求。特别是在垄断企业主宰的社会中,“制造出的消费需求”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满足人们正常需求的范围,并在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下,走上了无限扩大的道路,从而导致明显与环境不友好的消费社会的发展。

施耐伯格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后来又为世界体系理论的支持者所拓展,该理论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全球环境衰退的影响。按照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Emmanuel Wallerstein)的观点,现代世界体系在16世纪早期开始出现,并且由三种结构性位置组成:中心、半边缘、边缘。尽管这个体系本身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在这三种位置上的国家是可以发生变化的。中心国家通常掌控着获利的金融业、制造业,边缘国家为中心国家(后来也越来越包括半边缘国家)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5]事实上,该理论最初并没有关注环境问题。自从斯蒂芬·邦克(Stephen Bunker)以后,世界体系理论在阐释全球环境衰退中的洞见日益显示出来。^[6]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体系理论的支持者就森林采伐、二氧化碳排放和生态足迹等环境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跨国比较研究,揭示出当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对于全球环境衰退确实做出了不成比例的“贡献”,包括废物出口、污染产业转移以及自然资源进口等,都对全球环境造成了破坏。^[7]

但是,我们注意到,在人们细细体会诸如上述环境社会学家基于特定视角所提出的洞见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反思:如果说环境社会学家批评自然科学家谋求关于环境问题的“单因论”解释是一种进步的话,那么,有些环境社会学家自己是不是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单因论”呢?比如,施耐伯格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环境恶化之间关系的分析确实很有见地,但客观地讲,他对消费因素的忽视也是有缺陷的;再比如,世界体系理论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对于环境状况的负面影响,但是它对于身处世界体系之中的国家内部的生产组织和社会变革关注不够,这也是一种缺陷。

在此背景下,关于环境问题的“多因论”解释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事实上,环境社会学的重要创始人邓拉普和威廉·R·卡顿(William R. Catton)在20世纪70年代,就借用奥蒂斯·达德利·邓肯(Otis Dudley Duncan)在1961年提出的“生态复合体”(ecological complex)概念,从多个层面阐释了环境问题的复杂原因,以及各种原因之间的相互影响。^[8]邓肯的“生态复合体”概念强调了人类利用组织和技术手段主动适应环境这一思想,他把人类社会看成是由四个内在相关的要素组成的,即作为人的人口、该社会所使用的技术、该社会的组织状况和该社会所依存的物质环境,由此构成了所谓POET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人口并不是直接作用于环境的,而是通过社会组织和技术使用,人口、技术、社会组织彼此相关,交互作用,并共同对环境造成影响。当然,环境因素也存在着反作用。邓拉普和卡顿的贡献在于,他们将POET模型中的“O”(社会组织因素)进一步细化,区分为文化系统、社会系统和心理系统,以期进一步澄清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综合起来,也就是说,邓拉普和卡顿认为:可以从人口、技术、文化、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解释环境问题。这种解释明显是一种“多因论”的解释。

随着环境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上述“多因论”的解释框架日益显现出其优越性和预见性。今天的环境社会学家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国家内部的因素与全球化的进程,都在对环境状况产生重要影响。在一个国家内部,文化价值观,社会组织、制度与结构,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等等,也都对环境状况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个社会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盲目乐观主义的价值观念,一个社会中不适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一个社会快速变迁过程中的社会失范,以及社会中个体的种种不适当行为等多个层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导致并加剧了一个社会中的环境衰退。为此,实践中的环保工作必须基于对环境问题致因的综合认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全面的社会调整来达成环境保护的目标。很明显,这也正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涵。

三、环境社会学致力于推动缓解环境问题的社会变革与建设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建设”,而这正是很多环境社会学者的一贯主张。尽管在社会学理论中存在着所谓“价值无涉”与“价值介入”的争论,但是,环境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主张价值介入的。环境社会学家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不只是停留在对于环境问题的解释层面上。事实上,绝大多数环境社会学家都认为当今世界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研究环境问题正是为了探究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特别是通过积极推动社会变革、社会建设以及社会成员的价值、行为的调整,来促进环境问题的缓解。

正视环境因素对于社会运行的重要性以及环境问题的客观存在,这是推动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前提。而环境社会学的基本立场正是如此。事实上,卡顿和邓拉普在1978年发表文章提出环境社会学时,就明确区分了关于人类社会与环境关系的两种范式,即“人类例外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简称HEP)和“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简称NEP)。前者并不看重环境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后者则非常强调环境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认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自然的和生物学上的潜在限制。卡顿和邓拉普认为,传统社会学各流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正是都接受了“人类例外范式”,而环境社会学则是要对此进行批判,并主张“新环境范式”。^[8]在环境社会学后来的发展中,多数环境社会学家一直强调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并认定环境问题的客观存在,以至于著名环境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H·巴特尔(Frederic H. Buttel)指出,环境社会学具有唯物主义的内核。^[9]

建构主义环境社会学作为环境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本来对于理解环境问题的主观定义过程以及改进环境保护的策略是很有帮助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些环境社会学者,特别是欧洲学者,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不仅采用建构主义视角去解构环境问题与环境话语,甚至解

构环境或自然本身,声称没有真正的“自然”,自然是建构的产物,由此走向了极端的建构主义立场。但是,主流环境社会学家立即对此进行反击,指出此种立场不仅无视全球生态系统的客观存在,而且威胁到了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基础,实际上站到了环境社会学的反对者一边。经过环境社会学内部的激烈辩论,大多数建构主义环境社会学者退回到温和的建构主义立场,重新宣称他们并不否认环境系统的客观性和环境问题的现实性。这样,环境社会学内部对于环境与环境问题的立场更为统一了。目前虽然仍有学者采用建构主义视角进行有关研究,但是已经很少有人因此而将环境以及环境问题虚无化了。

在正视环境因素对于社会运行的重要性以及环境问题存在的客观性的基础上,环境社会学家围绕缓解环境问题开展了非常广泛的研究。1989年的一次调查表明,环境社会学研究涉及九个方面的内容:(1)环境研究的伦理标准、概念和方法;(2)对环境问题的描述与分析;(3)环境污染的影响;(4)环境立法;(5)环境政策;(6)环境管理;(7)环境意识、行为、运动和环境犯罪;(8)环境教育;(9)环境与信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研究中的一些内容进一步强化,如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分析、环境政策和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环境破坏与环境保护的社会机制分析、公众环境意识研究、环境运动研究、城市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等。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也得以拓展,如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经验性理论研究、环境公平、性别与环境、社会分层与环境、技术风险评估等。很明显,环境社会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在很多方面都直接指向缓解环境问题的社会实践,对于实际的环境保护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更重要的是,环境社会学与推进环境保护的社会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环境社会学可以说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环境运动催生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并在此后伴随着环境运动的兴衰而兴衰;另一方面,环境社会学对于环境运动的关注和研究,也在不断引导着环境运动的发展。在西方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到80年代的环境污染,再到90年代的全球环境变迁,环境社会学研究揭示出环境问题的演变趋

势,从而也引导着环境运动的发展方向。其中,美国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环境公正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有关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发表相关。

在环境社会学与环境运动之间的关系上,亚当·S·温伯格(Adam S. Weinberg)指出,“环境社会学者不是历史学家。我们也绝不是环境运动之秘密的保守者或者揭示者”。^[10]环境社会学应当持一种实用主义立场,与其置身事外,采用所谓社会学的方法对实际的环境运动做所谓的客观评估研究,倒不如与环境运动形成一种批评性研究者(critical inquirer)的关系。环境社会学者不仅应当关注实际的环境运动取得了什么成就,没有达成什么目标,而且应当关注环境运动应当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尤其是应当关注后者。环境社会学应当不断地重写和修正环境运动的主导标志和符号,利用环境社会学这一活跃的知识社区以及丰富的研究资源,来防止环境运动缺乏新意,老调重弹,令人乏味。此外,通过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还可以为环境运动的发展提供新的社会空间以及进入这一空间的途径,帮助实际的环境运动识别社会偏见、障碍以及没有预见到的各种困难。

我们注意到,基于学科的基本立场,大多数环境社会学家确实是环保积极分子。他们在开展学术研究、约束自身行为的同时,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积极传播环境保护的理念和相关的政策主张,努力推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建设。对于各种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和政策,他们则提出专业性的批评。例如,在美国,环境社会学家们对于布什政府的非环保作为就持非常一致的批评态度。在很多场合,环境社会学家们也会作为一名普通公众,自觉参与到推动环境保护的实践中去。

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为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

以上从三个方面讨论了环境社会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之间的亲和关系,特别是环境社会学为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所提供的学理支持。事实上,我们也深信:我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宏伟实践,必将为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提供大好

机遇,从而有可能促进中国环境社会学更加迅速的发展。

一方面,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提出扩大了对于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需求。这里,从需求的主体看,既包括了政府的需求,也包括了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公众的需求;从需求的内容看,既包括了理论层面的需求,也包括了实际工作层面的需求。特别是,对于什么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如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这类重大问题,迫切需要环境社会学者提供知识支持和科学回应。

尽管如前所述,环境社会学研究重视环境问题的社会因素,并且强调以综合性的视角研究导致环境衰退的复杂社会原因,但是,对于什么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如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社会学研究还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面临着加速经济增长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压力,如何在这种背景下建设一个环境友好型社会,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关于什么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例如,有人认为: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由环境友好型技术、环境友好型产品、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友好型产业、环境友好型学校、环境友好型社区等组成。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主要内容包括: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对环境 and 人体健康无不利影响的各种开发建设活动;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力布局;少污染与低损耗的产业结构;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人人关爱环境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11]也有人认为: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致力于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社会形态。就中国而言,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种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开放有序的贸易金融体系、注重社会公平的分配体系和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12]这些观点无疑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还应该进一步深

入研究。

关于在现阶段如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强调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与治理力度的重要性,指出到2010年,要使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基本遏制;要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由18.2%提高到20%。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也明确提出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13]很明显,这里指明了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所应努力的一些重要方向和所要达到的一些重要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必然要涉及很多方面的制度创新、机制转换以及观念转变,涉及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如何有效地推动这些方面的实际工作,仍然需要我们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面向中国的社会实际,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另一方面,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实践也将为环境社会学研究创造越来越方便的条件。一是国家投入的不断加大,将会带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研究与开发投入的不断加大,这为环境社会学研究争取更多的财政支持带来了机遇。近年来,国家环保投入有不断增加的趋势。2006年,环境保护支出科目被正式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要进一步增加环保投入,强调要把环境保护投入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各级财政都要调整支出结构,加

大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保证环保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二是国家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并且鼓励广大公众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这样就会引导社会力量的变化,激励民间环保力量的成长,从而为环境社会学观察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民间环保力量的活动过程和成长机制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此基础上,有可能深化中国环境社会学的一些基础性研究。

此外,就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实践为环境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方便而言,也许更重要的是环境信息的日益公开化,使得环境社会学者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到我国的环境状况、环保活动与政策、环境突发事件以及环境恶化的社会经济影响。2006年由政府直接发布或者由政府支持发布的一些环境信息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比如,新年伊始公开发布的“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5年度报告,5月公开发布的《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现状调查报告》,6月公开发布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9月公开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等等。我们可以预期,今后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将会得到越来越有效的保障,环境社会学研究所必需的一些重要环境信息也将更容易获得。毫无疑问,这是对环境社会学发展非常有利的东西。

总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提出与实践,对于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而言,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如果有志于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学者能够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基础上,面向中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实践,积极抓住机遇,认真应对挑战,那么,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美好未来就是指日可待的。当然,这里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进来,需要靠集体的力量来推动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 [1] Paul Ehrlich. *The Population Bomb*[M]. New York: Ballantine, 1968.
- [2] Barry Commoner. *The Closing Circle*[M]. New York: Knopf, 1971.
- [3] Riley E Dunlap.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 Socio-ecological Perspective[A]. Kore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ed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for the Better Human Conditions*[C]. Seoul: Seoul Press, 1994.

- [4] Adam S. Weinberg. *The Environment: From Surplus to Scarcit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5] E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M]. New York: Academic, 1974.
- [6] Stephen G. Bunker. *Underdeveloping the Amazon: Extraction,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Modern State* [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 [7] Riley E. Dunlap and Brent K. Marshall.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 Clifton D. Bryant and Dennis L. Peck (eds.). *The Handbook of 21st Century Sociology* [Z].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6.
- [8] W. R. Catton and Riley E. Dunlap.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J].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13, 1978: 41-49.
- [9] Frederic H. Buttel.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Sociology: Theoretical 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ynthesis [J]. *Rural Sociology*, Vol. 61, 1996, (1): 56-75.
- [10] Adam S. Weinberg.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Towards a Theory of Pragmatic Relationships of Critical Inquiry [J].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25, 1994, (1): 31-57.
- [11] 陈吉宁.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 [N]. 人民日报, 2005-11-17.
- [12] 潘岳. 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DB/OL]. <http://env.people.com.cn/GB/4571489.html>. 2006-07-08.
- [13] 温家宝.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N]. 人民日报, 2006-04-19.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the Building of a Pro-environmental Society

HONG Da-y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con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to the ideas of building a pro-environment society in China. It concludes that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cademically underlays the policies of building a pro-environment society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highlighting the social causality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econdly, emphasizing the symbiosis of the social causalities; finally, committing to initiate the social reforms and constructions in need to resolve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onversely,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China will benefit much from the practices of pro-environmental society building.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pro-environmental society

(责任编辑 武京闽)